

太平天国史从考乙集

罗尔纲著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九集

# 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

罗 尔 纲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责任编辑：陈汉孝

太平天国史丛考乙集  
TAIPING TIANGUO SHI CONGKAO YIJI  
太平天国史论文集第九集  
罗尔纲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75印张 字数 352,000字  
1995年5月北京第1版 199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500  
定价 25.00元  
ISBN 7-108-00800-9/K·168

# 序

## 一

《太平天国史叢考甲集》於一九七九年七月脫稿，至今又將四年了。

我首先要向三聯書店和讀者表示衷心的感謝。去年春，《太平天国史叢考甲集》剛剛出版，三聯書店就把它連同以前出版的七集《太平天国史論文集》同時重印。我這些粗陋文稿，有一位身患殘疾的讀者看了，他感動到流起淚來要學我那樣烏龜爬行似地去鑽研學問。又有一位讀者來信鼓勵我多多力作，「去照亮更多的人」。我這個毫無所知在學問大海中摸索的書獮子，寫的並非文藝作品，做夢也不曾想到僅僅這點兒鍥而不捨的精神就會這樣地感動年青的讀者，怎不叫我鼓舞。這部《太平天国史叢考乙集》（《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九集），就是在三聯書店和讀者們的鼓勵和支持下扶病奮力寫成的。

## 二

這部集子，共分五輯，第一輯收《李秀成偽降考》等三篇。《李秀成偽降考》是經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假設方法後，於一九八〇年冬寫成的。初擬送去參加一九八一年三月兩廣召開紀念太平天國起義

## 序

### 一

一百三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並在《廣西日報》、《歷史研究》上發表。後來認為還須重核，沒有送給討論會，只由《廣西日報》發表了第六節「一條證實秀成偽降計的曾國藩家口碑」<sup>①</sup>，《人民日報》在學術動態內也以《李秀成偽降新證》作了報導<sup>②</sup>。現在把它收入本集發表。《太平天国北伐事蹟考》寫於四十年代初，沒有發表過，我寫《太平天国史稿》曾引培它，多年來屢承讀者來信詢問，前已收在《太平天国史叢考甲集》內，後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的《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五輯內有新發現的有關太平軍北伐的史料<sup>③</sup>，故臨時把它抽出，一九八一年經過補充，現在收入本集內。《太平軍每軍實數及後期編制考》一文，考出太平天国前期軍隊的編制並不是照《太平軍目》每軍為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五人，而是二千五百人。這點考明，就會對孤軍北伐和前期兵力種種竭蹶的情況瞭如指掌。後期改變前期以軍師、旅、卒、兩的編制，以「隊」編制軍隊，即稱為某人的隊，這對後期兵為將有，不聽調遣，也追尋出了它的來源。

第二輯收《金田起義日期再考》等七篇。這七篇考證，都是為寫《太平天国史》而必須考明的問題。我寫過一篇《太平天国起義百年紀念日期的考證》，刊於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與《人民日報》社論《太平天国革命百週年紀念》同時發表，從此定太平天国金田起義日期為一八五一年一月十

① 見一九八一年三月二日《廣西日報》。

② 見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一日（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到一九七九年五月，有同志撰文提出異議。這時兩廣正在籌備紀念太平天国起義一百三十週年，要我表示意見。我寫了這篇『金田起義日期再考』，經過各方面討論和有關方面的決定，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週年紀念仍於一九八一年舉行。我于一九七四年『答紫金山天文臺問天曆應排到何年』，根據『遵王賴文光自述』說「丙寅十六年秋」的話，定為應排到太平天國戊辰十八年七月初一日（清同治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元一八六八年八月十六日）太平軍在山東徒駭河覆沒為止。此文收在『太平天國史叢考甲集』內。六年之後，吳雁南同志發現『民國宜川縣志』有「以太平天國十九年為正朔」的記載。我對這條記載進行稽查，考明它是可信的，寫了這篇『太平天國正朔補考』，這不但證實我以前的考證，而且有文獻明確地記載太平天國的紀元到了己巳十九年。現在排天曆，應改排到太平軍於太平天國己巳十九年四月十一日（清同治八年四月十七日，公元一八六九年五月二十八日）在陝西保安縣老巖窯覆沒為止。太平天國還有一支部隊到一八七二年才在貴州覆沒，如果將來有文獻記到這支部隊行使太平天國正朔事，我們還須要向後推。這兩篇考證，對太平天國史說來都是大事。

第三輯收『洪秀全在何年得到『勸世良言』？』等六篇。前四篇考證是為撰寫『太平天國史·上帝教志』而寫，全部六篇考證又是為撰寫『太平天國史·洪秀全傳』而寫的。對本集來說，却是為收在第四輯的『洪秀全論』一文，提供怎樣「論從史出」作說明。在太平天國史上，有個大問題，就是太平天國的上帝教，只是這個農民革命作為起義的工具呢？還是它的宗教革命呢？西方資產階級的史學家一般都認

爲是宗教革命，爲太平天国效勞的洋兄弟呤唎(A. F. Lindley)也說是宗教革命。簡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都說是宗教革命。六十年代，仍還有人撰專論洪秀全「對現存秩序無可奈何，用非常善良的，但也是最膚淺最愚蠢的道德自我改善理論來欺騙自己」，並從此作出洪秀全創立拜上帝會「也只是抱着悲天憫人的情懷，企圖通過宗教宣傳而使一切改邪歸正的辦法來普渡苦難的衆生」，把創立拜上帝會作爲發動起義的偉大革命家洪秀全論爲一個欺騙自己的悲天憫人的宗教家。這完全違背歷史事實的論斷。本集這四篇考證，一一考明洪秀全假藉宗教作爲發動起義工具的事實。《武略跋》一篇，從洪秀全刪改《武經三書》的地方，反映出他的多方面的思想，是以前從未發現過的。也由於今天考出了太平天国所刊佈的《武略》爲《武經三書》的改名，使爭論了三十多年來未解決的《洪秀全刪改的詩韻》究竟是部什麼書？實爲《詩經》的考證得到了一條例證。

第四輯收《洪秀全論》等三篇。近年接到讀者來信，說只見我的考證，希望我寫些論文。因此，本集特收這三篇論文。《洪秀全論》一篇，是一九六三年春南京紀念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一百一十週年學術討論會要有一篇論文在大會上宣讀，而與周鈞同志臨時趕寫的，是一篇急就章，現收入本集，特據近年研究進行補充和修訂。《太平天国史上的人民羣衆》一篇，是我寫的《太平天国史》卷一《序論》第一章開宗明義的說明。《論湘軍》一篇，則是一九八〇年重寫的《湘軍兵志》一書第一章緒言。做「論文」與做「考證」是兩種不同的作法。做「論文」必須綜合概括，做「考證」則應如法官的引據法律，數學家的證幾何，重在條分縷析。我青壯年時，雖曾寫過幾部史書，而三十年來，全部工作投入搜集史料、整理史

料和考據工作，要做「論文」，不但水平所限，難於提高到理論性上，就是文筆也感到了生硬，只好獻醜了。近年同志們主張寫論文要「論從史出」。這幾篇拙劣的稿子，或許可給讀者討論這問題時作一點兒的參考吧。

第五輯收《李秀成自述原稿考》、《李秀成自述原稿註前言》兩篇。《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偽問題，是太平天國史上三十多年來爭論最激烈的問題，至今未休。報刊上仍有論為曾國藩偽造的文章，甚至有人稱為「李秀成自述之謎」，因此，在史壇議論上，還有李秀成供詞的真假需要弄清楚的意見。如果《李秀成自述原稿》是真是偽，還沒有考清楚，那還有什麼真降、偽降可說。因此，本集既發表了《李秀成偽降考》，也就把這兩篇文章收在內，以供讀者看這篇考證時，同時得到參閱。

### 三

有同志說這幾年來史學界有些同志產生輕視理論重視考據的傾向<sup>①</sup>，問我怎樣看。我說：「這是不對的」。關於這問題，我今年改寫的《說考據》<sup>②</sup>一文，已經把我的意見說了。今天在這裏，把那篇文章

① 這種傾向，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三日，熊德基同志《史林漫拾序》、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光明日報》副刊《史學》第二四六期胡如雷同志《時代賦予歷史學家的中心使命》、一九八三年一月五日《光明日報》蘇雙碧同志《一年來史學理論的探討》等文均有論述。

② 此文收在《因學集》內。

中沒有說到的我國古代史學家怎樣對待考據向同志們談談。

以司馬光《資治通鑑》為例。這部書記載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二年）起，至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九五九）止，首尾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中國通史，它所根據的材料，僅正史一項十九種合計起來就有一千五百六十萬字，連其他史料算起來，要超過三千萬字。司馬光和他的助手劉攽、劉恕、范祖禹先做「考異」工作，凡遇到幾種書對一件事情記述有矛盾的時候，則下一番考訂工夫，取其可信的，捨其不可信的，這步工作，編成《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那時關於唐代雜史之類的書還保存很多，考訂更要費很大的氣力，所以《考異》三十卷中十九卷是唐代部分。我們讀《資治通鑑考異》所載各條，可以看出司馬光對於紛歧記述的去取的精確。正因為他對史料先做了「考異」的工作，所以才能寫成這部簡賅的名著出來。到了清朝初年，著名學者王夫之就根據司馬光這部名著所載史事，來闡釋歷代法制沿革，評論各代政治上的利弊得失，主張因時制宜，提出他的改革意見，寫成一部對後來思想界有影響的《讀通鑑論》。我們從《資治通鑑考異》、《資治通鑑》與《讀通鑑論》三者的不同與其相互的關係，就可見中國古代歷史家是把「考據」、「史書」、「史論」分開來的。「考據」是為寫「史書」的預備，「考據」的目的是為寫「史書」，「考據」並不等於「史書」。而「史論」必以「史書」為據，沒有「史書」，就不可能有「史論」。「史書」和「史論」都是有著者的立場、觀點的。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目的是教導封建統治者如何吸取前人經驗教訓以運用統治人民的法術，他的立場是站在地主階級的。王夫之《讀通鑑論》，評論歷代法制政治，提出他的改革主張，也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至於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考異》則只是對史書上

紛歧的記載進行考證，取其可信，捨其不可信，並不存在立場、觀點的問題。我們說明了我國古代史學家對「考據」、「史書」、「史論」的作法，就可以瞭然於他們怎樣看待「考據」在史學中的作用與地位。也就可知如果把那些只考史事的有或無、真或假的「考據」文章，指為「宣傳什麼」，或「反對什麼」，而加以批判，那是把對象搞錯了。

又說乾嘉學派。以著名學者錢大昕來說吧，他見《元史》「闕漏」、「舛誤」、「謬戾」<sup>①</sup>，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對《元史》加以考核，先撰成《元史考異》十五卷<sup>②</sup>，打算重修《元史》，後來懼怕陷文字獄，改為《元詩紀事》<sup>③</sup>。可見錢大昕並沒有把他的「考據」《元史考異》就看作「史書」，而是他修《元史》的第一步工作。當時人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傳》論他著的「廿二史考異」，蓋有「爲而作也」，並不是爲考證而考證的。錢大昕《癸亥新春》詩有句道：「獺祭難言博，蟲雕亦可憐，江湖多小集，若個姓名傳」<sup>④</sup>。這個被江藩論爲「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sup>⑤</sup>的大學者，說做考據「獺祭難言博」，是他的謙虛，但他把考據看作是給經世大業服務的「雕蟲

① 據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十三，答問十。

② 這十五卷《元史考異》，後收歸《廿二史考異》一書內。

③ 據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傳》。

④ 見錢大昕《潛研堂詩集》續卷十。

⑤ 見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錢大昕傳》。

小技」，到老只以考據留名，自嘆爲「蟲雕亦可憐」却是內心的真情。他怎樣看待考據的作用與地位，自己也表白出來了。

再看近今史學家。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著名史學家梁啟超，他寫了一本《中國歷史研究法》用了大量的篇幅教人鑑別史料、考證史事，他的目的是要人寫成一部「適合於現代中國人所需要之中國史」，並沒有主張「史學就是史料學」。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是以考據馳名的，他在寫了許多隋、唐史的名篇考據之後，又寫了一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史書，也說明他不是把「考據」就作爲史學的「完成」的。

那麼，主張「史學就是史料學」，究竟起於何時呢？看來是起於二十年代後期，有人把學術視爲粉飾昇平的東西，提倡了這一種謬說，造成了很壞的影響<sup>①</sup>。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六日，胡繩同志在廣州召開的兩廣紀念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上的講話《關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若干問題》<sup>②</sup>中特地加以批判說：

有這樣的歷史學派，他們認爲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就是把史料考證清楚。他們認爲，如果

① 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旨趣》中宣佈他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的宗旨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又說：歷史學和語言學「都不見得即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只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見一九二八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期）。主張「史學就是史料學」，就是由傅斯年提倡的。

② 見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日《光明日報》。

一個歷史事實有幾種不同的記載，那就要考證出哪一個記載最為可信，這就是歷史研究。如果一個歷史事實沒有不同的記載，那是沒有什麼研究工作可做。按照這種學派的說法，歷史研究就會陷入煩瑣的考證，而且止於羅列一堆歷史材料。

我們是重視史料的收集、考證工作的。研究歷史要從事實出發。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關史料的真偽，當然談不到科學的歷史研究。某些歷史事實的細節，如果對瞭解全局有關，化氣力進行考證、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輕重，不管它對全局的瞭解有無意義，凡是發生過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那就勢必陷入煩瑣的考訂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時我們還必須指出，史料學的工作，不過是史學研究的開始，僅僅是個開始，決不是它的完成，決不像主張「史學就是史料學」那一派的看法一樣。

考據只是歷史研究的第一步工作。歷史研究是要找到歷史發展的規律性，看出歷史發展中的本質的東西，其目的是爲了今天，爲了今後，不是爲歷史而歷史的。這種認爲「史學就是史料學」的謬說，不但大大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科學，也不是中國古代史學家的作法。胡繩同志的批判是十分正確和必要的。

#### 四

前年有一位雜誌編輯同志對我說：「近年許多評論太平天国人物的論文，爭來爭去，得不出一個

所以然來，現在我們暫時不發這類稿了。」這位同志去後，使我深思：大家都是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看問題，為什麼會得出相反的看法，得不到一致的結論呢？那是因為不曾先把事實考明，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才會如此呢？

在我國古代的史論裏面，最為人稱道的是王安石《讀孟嘗君傳》。這篇名文僅八十八字，不費吹灰之力，就推翻了「孟嘗君能得士」的千古評論。王安石之所以能如此，我們固然不能不承認他過人的觀察力，但是，如果他沒有司馬遷《史記·孟嘗君列傳》所記的種種事實為據，使他作出「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這一個堅強不拔使人信服的論斷，也斷不可能寫得出這篇名著來。

有個曾被稱為軍事學家的蔣方震論湘軍說：「湘軍，歷史上一奇跡也。書生用民兵以立武勳，自古以來未嘗有也。諺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則既成矣。雖然書生之變相，則官僚也，民兵之變相，則土匪也，故湘軍之末流，其上者變而為官僚，各督、撫是也，其下者變而為土匪，哥老會是也。」湘軍真是歷史上一奇跡嗎？湘軍是反革命巨魁曾國藩組織的新軍。蔣方震把它認為民兵，是錯誤的。作為湘軍將領的書生是地主階級，它的士兵則為農民。湘軍崛起的目的，不是如同蔣方震所說，要達到二千年來書生的至高理想，作為「王者師」，而是為保衛地主階級。這與我國古代民族間戰爭，民兵與其率領者共同為保家保國而戰的性質不同。湘軍士兵與其將領的關係是敵對階級的關係，其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所以當他們認識到被蒙蔽、受欺騙、幡然醒悟的時候，就加入哥老會來反抗地主階級，推翻清朝的統治。這並不是「歷史上一奇跡」，從湘軍的歷史看來，是一清二楚的。蔣方震

之所以有此錯誤的謬論，固然是由於他的階級立場，同時也由於他不明湘軍的歷史。

我們從上面舉出的一正一反的例子，可以看出評論歷史人物或論史，都必須有歷史事實為根據。去年有同志問過我怎樣去評論太平天国人物。我根據寫太平天國人物傳的體會回答他，說我對每一個人物的認識，都從掌握全面情況、尊重太平天國本身的定論、對後人的借鑑三方面去看，而以掌握全面情況為首要。要掌握每個人物的全面情況，就必須先把有關歷史事實考證清楚。這些拙見，我已在答覆那位同志的文<sup>①</sup>中說過，此處不再贅說了。

## 五

太平天國史的研究，在黨和人民的重視下，得到蓬勃的發展，培育成了一支力量雄厚的科研隊伍。這在我國歷史研究領域中是獨特的。據一九八一年春的統計，自「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連續三年召開了三次全國性的太平天國史討論會，收到論文五百多篇，深度廣度達到了新水平，成為學術上最活躍的領域之一」<sup>②</sup>。從這些成果看來，不但中年一代接上了老年一代，而中年一代還教導出了年青一代。目前，太平天國史的研究，正是這樣一代接一代，後浪推前浪在前進。

① 見給蘇雙碧同志《太平天國人物論集》寫的序文內。

② 據邢鳳麟同志《太平天國起義一百三十週年紀念學術討論會情況》，見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七日《廣西社會科學院簡報》。

我歡欣地面對着這大好情況，願與同志們乘風破浪共同努力向前。今天，這部小集，只不過是在同志們蓬蓬勃勃的成果裏面的一根小草罷了。其中疏誤之處，敬請教正！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羅爾綱謹誌於北京

# 目 次

序

第一輯

李秀成偽降考

一

太平天國北伐事蹟考

六三

太平軍每軍實數及後期編制考

一七〇

第二輯

金田起義日期再考

一八七

太平天國正朔補考

二〇四

——天曆應排到何年補訂

二三六

關於石達開大渡河覆敗的幾個問題補考

二三七

史料失審致錯舉例

二三八

——福建起義的小刀會領袖是誰？

二三九

太平軍和農民羣衆的反封建不是有意識的行動嗎？

二四〇

合揮釋

二四〇

洪全福假屍案

二四六

### 第三輯

洪秀全在何年得到『勸世良言』？

二五〇

洪秀全患的精神病真實症狀

二五九

洪秀全花縣水口廟題壁詩和劍詩

二七三

洪秀全撰著革命理論的年份

二八〇

洪秀全刪改的『詩韻』究竟是部什麼書？

二八四

『武略』跋

二九九

### 第四輯

洪秀全論

三一三

太平天國史上的人民羣衆

三一六

論湘軍

三七五

### 第五輯

李秀成自述原稿考證

三六一

李秀成自述原稿註前言

四七三